

CAMBRIDGE

Cultural Evolution

文化的进化

[英] 凯特·迪斯汀 / 著

李冬梅 何自然 / 译

卓新贤 刘录山 / 审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文化的进化

Cultural Evolution

[英] 凯特·迪斯汀 著

李冬梅 何自然 译

卓新贤 刘录山 审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化的进化 / (英) 迪斯汀 (Distin, K.) 著; 李冬梅, 何自然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5.7

ISBN 978-7-5100-9890-1

I . ①文… II . ①迪… ②李… ③何… III . ①文化发展—研究 IV . ①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9061 号

Cultural Evolution 978-0-521-76901-3 by Kate Distin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本中文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和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合作出版。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

文化的进化

著 者: [英] 凯特·迪斯汀

译 者: 李冬梅 何自然

审 校: 卓新贤 刘录山

责任编辑: 梁沁宁

版式设计: 刘敬利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155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13.75

字 数: 285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5-5109

ISBN 978-7-5100-9890-1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中文版序

2008年，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家得到了一只金毛猎犬鲍尔温（Baldwin）。在来我家之前，它是属于一个导盲犬慈善机构的，该机构专门为盲人和部分失明者训练导盲犬。我们并没有给它起名：一个英国天然气产业社组织为狗支付训练费，因此他们就根据当时他们的总裁约翰·鲍尔温先生的名字为它命名了。

导盲犬长大后才能参加训练，在此之前它们都生活在家里。鲍尔温从小就和我们呆在一起，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它接触各种不同的环境，使它能习惯于意外的、不熟悉的东西，这样当它成为工作犬时才能保持安静。我们带它去学校看看孩子们，去养老院看看老年痴呆症患者，去古老的石头教堂看看礼拜者。它坐过汽车、火车和公交车。我们带着它去闹市中心的商店，还沿着公共人行道穿过农场遛狗。在农场，它看到过马、牛和羊。大约一年之后，它离开了我家，被当作导盲犬来训练，但后来健康问题使它不能成为导盲犬，因此慈善机构又让它回到我家当宠物犬。在九个月的训练中，我们的大儿子每天都祈祷鲍尔温能回来，因此后来他高兴地连连点头：“我就知道它会回来的。”

鲍尔温的生活与人类文化的诸多方面均有一定的接触。事实上，狗是人类文化产物的物种之一，人类经过数千年将其驯化并

人为地选择了这个物种。甚至从我为它所提供的短暂的生活阶段，我们就能看到一些人类文化特征的广度和深度、差异性和复杂性：家养动物和慈善组织、行业和分级管理结构、商业协会和家庭生活安排、家庭惯例和教育模式、医疗和宗教、运输方式和零售商店、电气设备和公共建筑——这样的清单是无止境的。

但是，鲍尔温的生活和人的生活受人类文化影响的方式不同。比如，尽管鲍尔温和我的两个儿子一样都是在一个屋檐下长大的，但它却没有学会说话，而我的儿子从小就学会说话了。当然，它能够学会，甚至可以学会对特定词做出反应，如：“坐下”“等等”“过来”。但它却学不会组合性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的含义是源于其组成部分的含义以及那些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例如，像“蜜蜂在嗡嗡叫”“狗是棕色的”这样的组合性短语，只要知道其组成词的意思是什么以及英语是如何将词汇组合起来的，任何人都会明白这两个短语的含义。总的来说，现代自然语言是按其组成成分来区分的，它们的习得远远超出了狗或任何其他非人类物种的心智能力。有一些狗（特别是边境牧羊犬）对相对广泛的词汇能学着做出反应；一些圈养的黑猩猩能学会相对较多的符号；但是，据我们所知，组合性的自然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符号语）是人类所特有的。本书的论点是，人类语言为人类文化的进化提供了一种机制。

关于文化进化的主要观点

进化是在群体特征方面渐进的、代际间的演化过程。除非那种群体特征的变异在几代之间被继承下来，否则进化就不可能发生。事实上，被直接遗传下来的并不是群体特征的变异，而是遗传信息中变异的表达。在生物界，细胞机制能确保遗传信息中的变异代代相传。本书的观点是，在人类文化中，语言能确保人类接收并传播文化信息和资源中的变异。本书所介绍的重要观点之

一是自然语言和（我称之为）人工语言之间的区分，前者包括口语或符号语，后者包括书面语和数学符号，它们均使用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媒介。自然语言的进化主要是使人们在当地社会族群中彼此之间能更有效地交流。人工语言的进化主要是使人们在不同社会族群中更准确、永久、有效地对信息进行保存、传播和操纵。

然而，语言不仅仅是获得信息的渠道：它使我们能获得信息，也会影响我们思考那些信息的方式。每种语言都会以词汇和结构相结合的可能方式来限制我们对信息的理解，而且它不会帮助我们理解以不同系统来呈现的信息。这就是语言对文化进化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不止一种语言。在儿童的关键期内我们获得了母语中的自然语言，但在一生中我们还可以继续学习新的自然语言，以及许多新的人工语言：书面语、数学符号、音乐符号、地形图惯例、计算机编程代码，等等。这类专业性的语言与其所代表的信息共同进化，因此在其特殊的文化领域内它们特别适合于信息的操作和保存。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为专业性的文化信息提供了一种进化机制，并使人类文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得以拓展。

人类能够发展和学习所有这些不同的语言，因为我们具有独特的元表征心智能力——对符号及其含义之间的联系进行反思；对我们的想法进行思考——该过程具有一种潜能，可以使文化信息脱离于任何一种媒介或语言对认知和心理的束缚。这种将信息在语言和媒介之间转换的元表征能力——获得新的语言，然后当你敞开大门接收它们所携带的信息时，又使信息脱离原来的语境而进入不同的范畴、不同的限制——是文化进化背后的驱动力。它使我们不仅能获得信息，还能思考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对我们目前行为中潜在信息的影响加以识别和避免。

文化进化的解释力

本书还讨论了文化进化在我们理解货币方面的应用，但近几

年该理论也被有效地应用于理解组织上的演变（特别是参考了商业和管理方面的研究），也被应用于地图制图学、语言的多样性、社会规约和技术等方面。有一种新兴的共识，即文化进化可能会提供一种有助于综合理解人类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就像生物进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科学一样。在这一领域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跨学科的研究。

仅举一个例子：在2014年的一次伦敦研讨会上，来自不同学科和背景的专家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创新是进化性的吗？”该研讨会是由英国同行兼作者马特·里德利和美国格鲁特法律行为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组织者所关注的是要更好地理解创新，他们认为创新是提高人类福祉的关键性驱动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考虑到各个不同领域的贡献，诸如政策和法律、经济学和商业、灵长类动物学和人类学、哲学和心理学、历史学和生物学、政治学和新闻学。我受邀来概述文化进化理论，这个理论对我们理解创新会有什么作用呢？

正如上文所述，在进化的压力之下，为了更有效地表征，每一种人工语言均与一种专业性文化领域共同进化着。当我们获得这些专业性语言时，它们使我们准备好来接收它们所携带的文化信息，让我们接触到专业性信息和概念性工具——知识和概念，若没有支撑它们的语言，我们就无法获得它们。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每种语言都限制我们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思考它所表征的信息，而不会帮助我们获取它所能表征的信息之外的信息。因此，随着学科领域的进化，专家们更加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一种占上风的正统说法可能会出现，要挑战它则是很难的。在现有的范式中接受教育和大量投资的人，未必会受到欢迎，或者未必会发现容易接受一种创新性选择。实际上，也许有一种挑战正统说法的选择性偏见，特别是当学者们发现自己要在级别高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有压力，并发现在当前范式下所写的论文比挑战该范式所写的论文更容易被接受时。

如今，对知识、方法和技术上的检测这一偏爱并非总是坏事。在任何进化领域中都可能有诸多创新。在生物学中，有性生殖物种之间的物种障碍限制着每个种群中的遗传变异，却保护了基因库，这些基因库已经成功地进化了，并能在特定的生态位中生存，免受诸多不利变异的风险。而在文化中，我们也希望能在现有的知识之上建立和保护已被发现的文化成果。如果把我们的知识财富置于一种理论中，接受新观点，这对心理学和认识论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只要这些新观点与那种理论是兼容的，或者比那种理论更有优势足以弥补我们所浪费的投资。

问题在于，当目前的结构有效地保护着以前成功的创新时，还会阻止未来的创新。文化和学科间的分离会使信仰和态度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们了，因为我们是通过它们来看待世界的。而且，一个观点越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就越会变得不可见，因为每个人都是通过相同的透镜来观察世界的。

如果一种普遍的范式或技术变得有足够的优势，那么创新则需要孤立的种群中才能被培养出来，然后才能挑战主流。根据生物学，我们得知隔离对新物种的进化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在文化方面，技术可能首先作为富人的玩物而存在：是昂贵的雏形或展品，且数量有限。概念的创新可能在讨论组和不知名的专业期刊中才能培养出来。现有的文化信息已经发现了可利用的生态位，而且如果新奇的事物要想获得成功，它们就必须出现在安全的不同利基之中。

因此文化障碍并非总是坏事：它们能培养并成功地保护新奇的事物。但它们也可以用来保护过时或错误的事物，使其免于竞争和修正。如何才能保持平衡呢？解决方案在于人类的元表征能力和合作能力。

人类基本上是合作性动物，不仅会本能地激励自己去学习当地的自然语言以便接触当地族群中的文化和社会关系，而且也能学习人工语言以便打破社会和学科的障碍来接触信息和功能性关

系。不同文化代言者之间的跨文化或跨学科的合作可能会导致文化信息之间有创意的竞争。

我们的确需要专业人士：来获取在特定文化领域内协同进化的语言和概念；挖掘每个领域中更深层的知识和理解；开发每个领域的资源，使其得到理解和应用。

我们还需要敢于冒险的人士：去勘探和开采。我们需要提供一种结构和资源，使人们能够独立于诸多的竞争去探索新的领域——创意和技术。

我们需要鼓励人们分享他们的发现——打破文化和学科的界限进行合作——把每个领域中的发现进行结合并重组，不仅要产生一系列新的、更多样化的信息，而且也要生成更大范围的技能和元表征趋势，这两者会共同创造出一些有利于出现成功创新的条件。正当我们遇到选择性时，我们才会开始进行比较和选择：进行元表征，因此才会创新。

我们合作的本能使我们可以使用共同的语言，语言使我们准备好去接受它们所传递的信息。我们的元表征能力使我们能够继续获得和开发新的语言；从代码中释放信息并以另一种代码来表征它；打破文化和学科、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对信息进行比较和重组。特别是，人工语言为专业性文化知识的深度和多样性提供了进化机制——而且人工语言也促进和维持着功能性关系，通过这一关系，原本彼此间没有社会关系的人能够打破社会、地理和时间界限而进行合作——创建一种渠道，这样大量的不同观点才会涌入文化库。

再重复一遍：文化进化理论告诉我们，不同文化代言者之间的跨文化或跨学科的合作会鼓励创新，其方法是通过创建文化信息间高效的竞争。

“创新是进化性的吗？”关于这一问题举办过一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各个学科的专家。这一事实足以告诉我们，人类文化进化理论的应用势头越来越大。该理论正越来越受到学者们和实

践者们的关注。正如我在《自私的模因》中文译本的序言中所提及的，文化进化的解释力已经跨越了国家和文化的障碍得到了验证。

很荣幸，在中国也能看到我的著作。我非常感谢李冬梅教授不辞辛苦地翻译本书和《自私的模因》，感谢何自然教授对两本书翻译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他参与两本书的部分翻译和审校工作。本书中的观点，至少到目前为止，经得起我所遇到的每个文化领域应用的考验，而且我毫不怀疑，文化进化理论将继续为我们理解人类文化这一独特现象的起源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凯特·迪斯汀

2014年12月

（李冬梅 译，何自然 校）

中文版前言

进化理论的发展对应着物种起源的问题：这也是达尔文所谓“奥秘中的奥秘”的问题。是什么使得我们眼前的自然界变得如此纷繁复杂和千姿百态呢？答案就是进化：是生物以种群为特征，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洗礼而产生的渐进变化。

我们正在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进化理论不仅可以成功地应用于自然界，也可以成功地应用于人类文化。尽管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细节千差万别，但无论那些变异要经历多少代才能被差异性地遗传下来，也无论要通过什么样的遗传媒介，在其千差万别的变异中总能观察到一个进化的过程。文化信息中变异的保存和传递不是通过生物代之间的代际传承，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承；传承的实现也不是通过 DNA，而是通过诸如言语和符号、纸张或硬盘等媒介的人类语言来完成。

模因？

谈论文化进化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模因”这一术语来指称文化进化的单位，就像基因是生物进化的单位一样。作为生物信息的单位，基因的表征需要以 DNA 的形式来表述。就任何信息而言，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永远不会孤立地存在；信息总是依赖于知道如何对其进行恰当解读并能做出反应的接收者。要从信息源中提取信息，接收者需要具备区分信息源变化方式的能力：能够将信息源的变化分解成离散的信息块，并能区分各信息块之间存在的差异。在生物界，细胞机制对 DNA 链的离散，目的是从中获得遗传信息，并恰当地加以利用。同样，在文化中，如果我们要接收信息，并对其做出恰当的反应，也必须将信息离散地表征出来。按照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1989）的说法，我们可以把文化信息的离散单位称作模因。

道金斯的观点一致饱受某些人的诟病，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文化信息的离散单位会是什么模样。诚然，人类文化不可能被整齐地划分成自然的可识别单位，但这在自然界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遗传信息的保存和传递有赖于这样的离散单位，但对生物体、病毒以及它们的行为而言，遗传信息的表达又很难分解成离散的信息包。例如，所有个体的肤色对应于离散的基因变异，但其基因的表达又是通过某种肤色变异的连续体。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要对某一种群特征的变异进行离散并非易事，尽管其特征是作为遗传信息离散单位的表达形式。同样，文化进化理论并不是要声称人类文化可以被直接分割成离散单位。它要阐明的是，人类文化是文化信息离散单位的复杂表达；只有通过学习如何将语言离散化，人类才能接收文化信息，因为信息的表征有赖于语言的表述。例如，配料和制作说明的离散变化可以使按不同菜谱制作出的同一道菜产生差异，但这类制作说明却形成了该道菜制作的变异连续体。因此，无论是在文化界还是自然界，如果信息要被接收和表达，它就必须被离散地表征出来。“模因”也仅仅只是一个用于指称文化信息单位的名称而已。同基因一样，模因也并非神秘至极：其表达总是有赖于某一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其实现也总是有赖于某一具体的物理媒介，无论是人类的大脑、言语或手势，还是某种具体的文化产物。

我在写本书时选择不使用模因这一术语，部分原因是因为（至少在英国）该术语激起了某些人对其所表达内容的本能抵触。另一个更为积极的原因是，我在《自私的模因》一书中已经阐明了模因概念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其中一位审稿人还将其称之为“模因论领域的一次优秀、彻底、全面的展示和评论”——我在第一本书中所探讨和发展的观点，牵动着我进一步反思语言在文化进化中的作用，反思文化和基于文化的信息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我在《文化的进化》中的目的是要探索一种基于语言的文化进化理论，以及该理论在理解人类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的作用。由于本书侧重于讨论遗传信息及其在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中的表达，所以，我认为模因论术语在本书的讨论中也不再是那样举足轻重了。

非人类文化？

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只有人类才具有习得和使用语言所必需的特殊认知、社会和生理能力。自然语言提升了我们的交际能力，其他物种则不具备像我们那样的合作的本能，因而也不具备能使其交流更为有效的遗传诱因。对于诸如口语、书面语、数学符号和制图规约等组合性语言而言，其学习和使用的能力有赖于表征和元表征能力。这是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能力，它们也没有灵巧的口和手来生成语言所需的声音和书面符号等这类媒介。

这就意味着其他物种不能像人类那样分享文化信息。正是语言——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为文化的进化提供了所需的机制。既然其他物种不能像人类那样学习和使用语言，它们也就不能产生人类所创造的复杂和广泛的文化，因为文化信息的表达有赖于人类各种语言的相互交流。

本书提出了一种文化进化的理论，并阐明了它在理解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使人类能够接收和

传递文化信息资源中的变化，本书也旨在解释这一机制的成因及其作用。基于语言的文化进化理论有众多可能的应用领域，到本书结尾时，我们已经探讨了其中的一些可能的方面，另一些则一直是其他一些学者近期研究的主题。该理论在其他文化领域内的应用还具有巨大的潜能，当然也包括对语言学本身的研究。

凯特·迪斯汀

2015年2月

(李冬梅 译，何自然 校)

译者说明

《文化的进化》是译者继《自私的模因》译著之后出版的第二本译著，也是原作者迪斯汀博士的第二本专著。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桂诗春教授在为何自然、陈新仁教授等合著的《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写的序言中说过：“独立作家迪斯汀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自私的模因》（2005），另一本是《文化的进化》（2011）。后一本书的附录是她的一篇文章：《那么模因论又怎样？》。在文章里她谈到这本书完全可以用模因论来解释，但她却刻意避开模因的说法，因为这个术语受到很多批评，而且广泛地被误用，特别是在互联网的许多网页上，这个术语既没有定义，又被含糊地使用。她的第一本书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站得住脚，但尚没有为社会所接受。”于是，桂先生接着指出，“Distin 故意不使用模因论语言去讨论文化的进化，而是用信息及其继承理论来把生物和文化信息集合在一个具有更大解释力的红伞下，说明人类是怎样从生物进化里独立出来的”。

这里引用的第一段是桂先生转达了迪斯汀认为文化的进化其实可以用模因论加以解释的观点，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迪斯汀刻意用文化进化的理论来讨论模因论中的问题；而第二段则表述了迪斯汀的另一个看法，认为讨论文化的进化，应该对人类如何超越模因、如何用信息及其继承理论将生物和文化信息相结合，以

及如何从生物的进化中独立进行深入的探讨。迪斯汀的这本著述探讨的重点正是桂先生在转述中提到的问题。在她的两本专著中，后一本专著在前一本专著论述文化信息表征的基础上，对文化的进化做了更深、更广的探索。

本书的第一译者主要负责主持翻译工作、安排翻译任务、校对、编排和统稿等事宜。各部分的初译者分别是：钱一（第1、2、3章）、李冬梅（第4、5、6章、中文版序、中文版前言、译名对照表及索引等）、吴静（第7、8、11章）、王秀芹（第9、10章）、付滢（第11、12、13章）。第一译者对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反复校对，每次遇到令人费解的术语和难题都及时向何自然教授和原作者求教。第二译者对整个翻译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和审校，并邀请了西南石油大学卓新贤教授担任本书的第一审稿人，充分保证了本书的翻译质量。此外，南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刘录山教授对本书中有关生物学和工程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做了详细的审校，避免了术语不当或表述方面的失误。本书虽经卓新贤和刘录山两位教授的后期审校，如译文尚存不足或误译之处，概由译者负责。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要由衷地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心何自然教授的鼎力支持、悉心指导和推荐出版，并参与部分书稿的翻译和审校工作；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郭力教授对原著学术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将该书译成中文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原著作者迪斯汀博士特意为中译本提供英文的中文版序和前言，并多次耐心、详细地解答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所提出的诸多问题；感谢卓新贤教授、刘录山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精心审校；感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同事们为本书所做的初译工作，没有她们的付出，就难以保证本书的翻译质量和进度；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梁沁宁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李冬梅

2015年2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一个普遍规律所产生的几个小结果”	1
--------------------------------	---

第一部分 文化信息的传承

第二章 信息是什么?	11
第三章 信息是如何被传承的?	27

第二部分 文化信息的传承：自然语言

第四章 自然语言和文化	51
第五章 自然语言是如何进化的?	66
第六章 语言、思想与文化	83

第三部分 文化信息的传承：人工语言

第七章 人工语言是如何进化的?	95
第八章 人工语言、表征与文化	113